

遗址位置与工作概况

林鸟台遗址位于湖北省潜江市张金镇三定村一组。2025年6月至9月，为配合张金镇服装工业园基建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潜江市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表明，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彭头山文化，明显早于湖北鄂西的城背溪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目前湖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北至幸福公路，东以三支渠为界，西至园区二支路，南以燕妮服饰厂为界。遗址东北距离潜江市区55公里，西荆河从遗址西北670米处流经，四湖总干渠从遗址西南2公里处流经。遗址所处水系总体仍属于长湖水系。根据工业园建园之前的地形地貌，遗址所在地原为一处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台地，原名为老台，总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勘探表明，遗址南、东、西三面均为淤泥沉积，属于多年前已填平的岑湖的一部分，遗址原地貌应三面环水，与现在地形地貌差别较大。遗址东北部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林家鸟台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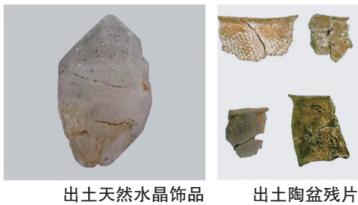
遗址海拔高程为27.57米，其他地方海拔高程与之相差不过0.5米。勘探表明，遗址南北长约470米，东西宽320米，但在此范围内，文化层均有分布，但分布不连续，核心区位于遗址东部偏南，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

本次发掘地点位于遗址核心区南部，合计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9月份为了解遗址北部堆积状况，在北部开挖两个探沟，合计发掘面积1418平方米。

遗址文化层堆积与主要遗迹

文化层堆积较为简单，以TN04E03为例，第①②③层为耕土层和近现代扰乱层，第④⑤⑥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文化层位于地表下约0.3~0.5米，越往东，埋藏越深。文化层厚约0.5~0.8米。文化层主要出土于第④⑤层，第④层土色黄灰色，土壤粘性较强，主要分布在发掘区东部；第⑤层土色偏灰白，质地致密板结，粘性较差，似粉砂质黏土，是文化层的主体，勘探发现遍布整个遗址；第⑥层出土文物极少，近似于生土。

发掘揭露的遗迹较少，共发掘各类遗迹9处。其中灰坑3个、灰沟2条、陶片堆积2处、柱洞2个，以G1最为重要。根据揭露的遗迹分析，发掘区应为聚落的生活居住区。G1位于发掘区北部，规模较大，位于TN05E02、TN05E03、TN05E04、TN05E05北部，由西向东贯穿整个发掘区，两端位于探方外未发掘。灰沟开口于第⑤层下，打破第⑥层和生土层。东西长32米，南北宽约3米，由西向东逐渐加深，从沟壁和沟底的情况看，沟壁较陡，沟底中间深，靠近沟壁略浅。值得注意的是，G1中部(TN05E04)还保留了一个向外的生土埂，宽约1米。显然，这是一条人工开挖的壕沟，中间的生土



出土天然水晶饰品

出土陶盆残片



出土小型砍砸器、雕刻器

出土磨制石器



出土陶釜残片

出土陶双耳罐残片



G1航拍照片

本版责编：冯朝晖 张 宸 郭晓蓉

湖北江汉平原核心区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属特意保留，以便通行。沟内堆积分为2层，第1层为灰黑色土，仅分布于G1东部，以生土埋为界，东部均有发现，西部未见，陶片主要出土于这一层。第2层为灰褐色粘土，土质板结致密，出土陶片较少。沟内出土陶片较多，主要集中在东部，绝大多数为夹碳陶，以红陶为主，少量灰褐陶，器表一般饰有绳纹，以粗绳纹为主。可辨器形有釜、双耳罐、长颈罐、盆、大平底盘、支座等，部分陶器可修复。

遗址出土石器与陶器

总的来看，该遗址出土石器数量较少，共出土各类石器43件，这与鄂西长江两岸的城背溪文化遗址动辄出土数千件石器形成鲜明对比。石器根据制作材料又可分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天然石器三类。打制石器数量普遍形制较小，仅有1件器形略大，从质地看，有燧石、石英砂岩、硅质岩等。石器类型有小型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等。磨制石器数量较少，器形有石斧、石锛等，制作较为精致，其中2件残石斧、1件石锛为花岗岩，通体磨制，体现出较成熟的制作水平。天然石器数量较少，一般为利用天然砾石直接使用，主要类型有砾石、敲砸器等。砾石可见一面有一道较深的凹槽，敲砸器多为卵石，在石器的一端往往留有敲砸使用的痕迹。

另外，该遗址出土一件天然水晶，保存较好，极为罕见，是目前长江中游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晶饰品。

林鸟台遗址出土陶片数量较多，主要出土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第④⑤层和G1，其他遗迹H1、H2、G2也有少量出土。还发现两处由破碎的陶片形成的陶片堆积，原因不明。从出土状况看，陶片普遍较为破碎，未发现可复原的完整器，由于陶质较差，烧成的火候较低、吸水性强，从泥土中提取较为困难。出土陶片具有鲜明的特征，从陶色看，以红褐陶为主，少量灰褐陶。陶色较为斑驳，杂色和混色现象较为普遍，并有器物内壁和外壁颜色不一样的现象，如外灰内黄。从陶质看，陶质较差，质地较为疏松，以夹碳陶占多数，从陶器断面看，中间有一层黑色的胎心，部分可见夹碳颗粒。从纹饰看，绝大多数陶器均有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另有少量刻纹，还发现少量素面红灰陶。陶器器形较为单调，以各种罐、釜数量最多，另有少量釜、支座、大平底盘、纺轮等。其中长颈带耳深腹罐、小口高颈罐、窄折沿的圆底陶釜、微折沿直腹盆、马鞍形支座、浅腹圆底盘、窄沿深腹盆等较为普遍典型。对此发现，林鸟台遗址出土陶器与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陶器最为接近，以上典型陶器多数都能在八十垱遗址找到同类器。

遗址时代与重要意义

林鸟台遗址出土的陶器特征表明，林鸟台遗址时代明显早于目前鄂西地区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其文化特征高度类似湖北北部的彭头山文化，大致相当于《彭头山与八十垱》报告分期中的第二、三期。对其文化命名，鉴于其与城背溪文化的明显区别，且远离城背溪文化区，而与彭头山文化更为接近，可称之为“彭头山文化林鸟台类型”，其绝对年代不晚于距今85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这是目前在江汉平原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长江以北、荆州以东的江汉平原核心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林鸟台遗址的发现，说明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在北上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在西北方向经松滋向鄂西发展成城背溪文化，还同时向东北方向越过长江，向江汉平原核心区发展，这对于我们认识江汉平原本土文化的来源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遗址发现的三足钵及其他三足器，应来源于中原地区的贾湖文化，说明在距今8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文化之间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和文化交流。

根据本次发掘，结合前两次勘探与调查，林鸟台遗址分布面积不低于5万平方米，发掘区揭露的G1，很可能是遗址内部一条具有排水、用水和防御作用的壕沟，说明人类对于聚落营建有明显的规划设计。这对于探讨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聚落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林鸟台遗址位于江汉平原核心区，目前在江汉平原核心区江陵、潜江、仙桃、石首、监利等地发现的遗址数量非常多，本次发现的林鸟台遗址，位于沙洋至沙市到潜江、江陵的西北东南走向的古老台地上，台地的四周为湖泊或沼泽地。林鸟台遗址的发现，证明在8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江汉平原核心区的古老台地比较适合人类居住，随着江汉平原数千年来地质沉降运动，商周以后，南部逐渐下沉，水系也逐渐向南倾斜，导致江汉平原南部逐步成为著名的蓄洪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林鸟台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对于了解江汉平原地质、地貌的演化，开展环境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潜江市龙湾博物院 执笔：刘辉 龙永芳 李宝龙)

发现

2025年阿房宫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

阿房宫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在渭南上林苑中选址营建的秦帝国朝宫。据记载，随着秦的二世而亡，阿房宫营建被迫终止，即文献所载“阿房宫未成”。

1994年西安市文物局组织队伍开展了阿房宫遗址的首次考古勘探。2002年至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在李毓芳先生带领下对阿房宫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局部发掘，确定阿房宫为东西长方形夯土台基，东西约1270米，南北约426米，面积约54.1万平方米，确定阿房宫未建成、未经火烧，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因考古成果与杜牧《阿房宫赋》所述内容有别，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2015年至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对阿房宫遗址开展考古勘探过程中，逐步发现在巨大的阿房宫台基之下，存在着面积大且堆积厚的黑色淤泥为代表的水相沉积，提示在修筑阿房宫之前当地曾有一长期积水的“洼地”。

为验证、确定台基夯土下淤土分布、时代和性质，了解与其相关的阿房宫选址原因，探索阿房宫台基夯筑过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5年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阿房宫台基中部偏东，原聚驾庄村村西拆迁区择点开展考古发掘。发掘布设南北长152米、宽6.5米“探沟”一条，受两条东西向生产路分割，发掘区分北、中、南三段，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

确定发掘区内阿房宫台基南缘的准确位置

通过发掘，在发掘探沟南段的北部清理出阿房宫夯土台基南缘立面，其上被后文所述的第2层硬面覆压，高1.3米。在南缘向南为未经夯打但因被长期碾压而较紧密的斜状花土堆积。在南缘立面以南发现疑与夯筑台基相关的立柱等遗迹。

在2002年开始的阿房宫考古勘探中，因台基东部被村庄占压而无法开展全面勘探，故台基东段的南缘多据西侧勘探所示南缘复原。2025年发掘确定的台基南缘位于之前复原的南缘之北约32米。考古队在确定发掘区内台基南缘后，向北探寻台基北缘，确定该处至台基北缘距约407米。

在2003年开展的阿房宫考古发掘中，在2025年发掘点西南约300米处曾发掘确认台基南缘，并在南缘之南发现铺瓦遗迹。从两次考古发现看，阿房宫台基的南缘非以直线形式存在，当据需要有所调整、变化。

确定阿房宫台基起建于连续淤泥之上

发掘确定，发掘区内的阿房宫台基下分布着连续残存的淤泥，之下为黄色生土，淤泥中仅见数枚残碎的新石器时代陶片，表明在阿房宫营建之前的史前时代该地曾有人类活动。从堆积情况看，淤泥底部呈南高北低的坡状分布，夯土之下的淤泥厚约0.5~0.6米。

发掘区南端淤泥底部的海拔约为356米，台基夯土南缘下淤泥底部海拔为356米，发掘区北段清理的淤泥底部海拔约为355米。从发掘情况看，淤泥底部呈北低南高，夯土之上逐层夯打夯土。

发现

河南宜阳苏羊遗址考古发掘新收获

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西部、下村南部，遗址坐落于洛河南岸的二级阶地和黄土塬上，北临洛河，南望熊耳山，核心面积63万平方米。2024年度的考古调查面积30万平方米，勘探面积4万平方米，在苏羊遗址东北部台地区域调查发现灰坑、墓葬等遗迹。202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仰韶中晚期房址区、龙山时代墓葬区、遗址南部壕沟三片区域进行，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共发掘各类遗迹108处，其中墓葬75座、灰坑20座、房址10座、沟3条等。

为进一步确认2023年发现的仰韶晚期大型墙垣的性质和功能，对比墙垣两侧遗迹分布及性质，在墙垣南侧布方发掘，目前发现有仰韶中晚期中、小型房址，灰坑等遗迹，房址年代多为仰韶中期，部分房址发现有青灰色水泥地面，形制和建筑工艺与往年发掘的同时期房址相同。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墙垣南侧遗迹的数量分布、规模、等级较之北侧明显较低。同时通过勘探发现2023年发掘的仰韶晚期大型墙垣向东延伸44米，加上之前发掘的30米，墙垣现存共计74米，为探讨墙垣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

继续发掘龙山墓葬区，以期完善龙山时代墓葬群的分布、分期以及不同时期墓葬的布局及分布规律，寻找反映当时社会复杂化的相关证据。龙山时代墓葬区新发掘墓葬75座，均为土坑墓，盗扰较严重，大多数头朝西，少数随葬有玉石器。还发现少量存在特殊葬俗的墓葬，一类是墓坑四壁堆砌河卵石，数量不等；另一类是先在墓葬底部平铺一层陶片，然后将墓主人平放在陶片层上，少量墓葬中存在指骨与掌骨分离的现象，疑似为剖体葬。在墓葬区下层发现6座仰韶文化晚期半地穴房屋，房址保存较差，仅在室内地面发现少量红烧土痕迹，推测为灶，从现场情况来看，这批房址使用时间可能较短。

发掘遗址南部东西向壕沟，确认壕沟年



TG20南段-硬面2全日照(自北向南)



TG20南段西壁正射影像(局部,自东向西)



TG20中段夯土1、2分界线带标尺(自东向西)



TG20北段-夯4夯层土色变化(自北向南)

经2025年发掘确定，在营建阿房宫之前，该地为一面积巨大的“水池”或“湖泊”，高大的阿房宫夯土台基建设于湖底淤泥之上。据前期勘探，在阿房宫台基以西、以北和以南的大部分基本不见淤土，以东虽受现在建筑影响无法勘探，但从既有了解看，在阿房宫台基之外不同样不见淤土。大面积淤土的分布表明，该区域曾是一个深度不等的湿地或湖泊。

从发掘情况看，阿房宫台基下不同位置的淤泥残存厚度基本相同，约0.5~0.6米，表明在阿房宫营建前在排干“水池”后，应先对“池底”淤泥采取“同厚性”处置，在“水池”中心较深、淤泥较厚之处开展较多“清淤”，靠池边处淤泥较薄处“清淤”较少，形成由外向内逐渐深下的台基“基槽”，靠缘处较浅，近中心处深，后期淤泥之上夯打的夯土厚度则中间明显较厚而边缘略薄。

阿房宫营建过程的新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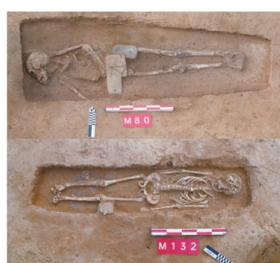
(1)发掘区内分布上、下两层踩踏硬面。受晚期严重破坏，上层硬面仅见于位于发掘区南端，厚约4~6厘米，残存南北长约4.4~4.9米，北高南低。其下6~45厘米为下层硬面，最薄处厚约7厘米，最厚处约20厘米，一般厚10厘米左

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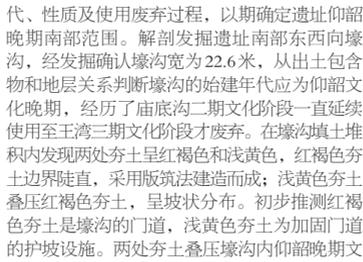
河南宜阳苏羊遗址考古发掘新收获



仰韶晚期大型墙垣分布图



M80(上) M132(下)



壕沟发掘区航拍图



壕沟内夯土剖面图(北壁)

代、性质及使用废弃过程，以期确定遗址仰韶晚期南部范围。解剖发掘遗址南部东西向壕沟，经发掘确认壕沟宽为22.6米，从出土包含物和地层关系判断壕沟的始建年代应为仰韶文化晚期，经历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一直延续使用至王湾三期文化阶段才废弃。在壕沟填土堆积内发现两处夯土呈红褐色或浅黄色，红褐色夯土边界陡直，采用版筑法建造而成；浅黄色夯土叠压红褐色夯土，呈坡状分布。初步推测红褐色夯土是壕沟的门道，浅黄色夯土为加固门道的护坡设施。两处夯土叠压壕沟内仰韶晚期文化堆积，同时被王湾晚期文化灰沟打破。

仰韶晚期大型墙垣和冲沟外围仰韶晚期房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明晰遗址仰韶晚期—龙山时代的聚落范围、布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龙山时代墓葬区不同时期和类型墓葬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生产技术与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壕沟内发现的采用版筑法建造而成的夯土墩台式通道，这种“门道构造+外护坡”结构系洛阳盆地首见，印证了新石器晚期聚落防护技术的突破发展，为了解史前环壕聚落通道形态提供了新的个案。

总之，通过2024年度的发掘进一步深化

了遗址聚落形态与演变发展的认知，也填补了洛阳盆地新石器夯筑技术发展史的空白。遗址中呈现的规划智慧与社会分化现象，对解码中原早期文明形成机制具有坐标意义。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执笔：谷向乐 任广 翟霖林)